

“利瑪竇與肇慶”特輯
澳門的公共性防疫

西醫入華與京澳關係
湯顯祖在嶺南



RC

文化雜誌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MATTEO RICCI

RC

文化雜誌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編輯委員會

何麗鑽 Marie MacLeod

Luís Ferreira 黃曉峰

Paulo Coutinho 林曉白

編輯部主任

Luís Ferreira

中文版

執行編輯

黃曉峰

外文版

執行編輯

Paulo Coutinho

美術設計

馬偉達 (Victor Hugo Marreiros)

編輯部

澳門塔石廣場文化局大樓

電話：(853) 83996322 / 83996323

傳真：(853) 28366806

電郵：rcc@icm.gov.mo

出版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澳門塔石廣場文化局大樓

電話：(853) 28366866 (總機)

網址：www.icm.gov.mo

植字排版

澳門東堡植字排版公司

印刷

澳門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印數

1,500 冊

ISSN 0872-4407



關心澳門文化 訂閱《文化雜誌》

零售價格（不包郵費）

澳門：澳門幣 80 元；澳門以外：10 美元

優惠價格（不包郵費）

訂閱全年四期或一次購買四本可獲半價優惠

郵寄費用

中國及亞洲：（每本）空郵 -13 美元；平郵 -4 美元

世界其他地方：（每本）空郵 -19 美元；平郵 -6 美元

可以使用書後附頁郵寄訂購或前往澳門中央圖書館、歷史檔案館、觀音蓮花苑以及澳門各大書店購買《文化雜誌》。

地址：澳門塔石廣場文化局大樓

《文化雜誌》編輯部

電話：（853）83996322

傳真：（853）28366806

郵郵：rcc@icm.gov.mo



封面引言

封面側立着一位儒冠儒服右手輕攏起折扇左手指點着山河卻分明有一副洋博士奇特相貌的美髯公倘再瞷到他下擺那兒又分明地標上了一行 MATTEO RICCI 的大寫洋文那準可讓人作出推斷這可親可敬的造像原型必為16世紀之入華天主教意大利籍耶穌會士利瑪竇無疑了。

利氏於1583年9月10日經澳門踏入內地開始其奔波歷險傳奇故事似的中國傳道之旅，尤以其中華文明之邦傾其畢生之力創作與譜寫了一大冊主旋律浩瀚莊嚴而各樂章奇崛跌宕的神曲，或可題其名為“中西近世精神交會第一交響樂”！倘翻開這想象中的異常沉重滿布歷史灰塵的總譜就可瞥見在題為“澳門，澳門！”的〈引詩〉之後所展開的〈第一樂章〉就是題為“廣府肇慶之戀，1583-1589”——說到這兒不少遠方遊子心中禁不住潸然撩起了一段西江沿岸令人神往的鄉土情思……

2006年底就是在風景如畫的肇慶舉辦了那裡的“第一屆利瑪竇與中西文化交流研討會”，並在城中利瑪竇曾經踏足的麗譙樓舉辦“溝通中西文化第一人——利瑪竇”大型展覽。彼情彼景，感人肺腑至深矣，亦令當地涵蘊極深的歷史文化視野為之燦然一亮。本刊徵集了與會學者的精采論文安排在今期以饗讀者，“利瑪竇與肇慶”這個特輯想必亦為敝刊的收藏者倍加珍貴。

《文化雜誌》·第六十六期

致謝作者與提供資料機構

雷 強

黃啟臣

司徒尚紀 許桂靈

彭少輝 黃世瑞

王超傑

范曉君

邱瑞祥

謝貴安

蕭健玲

劉偉鏗

何凱文

馬格里奧庫勒 (Francesco Maglioccola)

董少新

郭衛東

葉 農 于麗萍

黃鴻釗

張廷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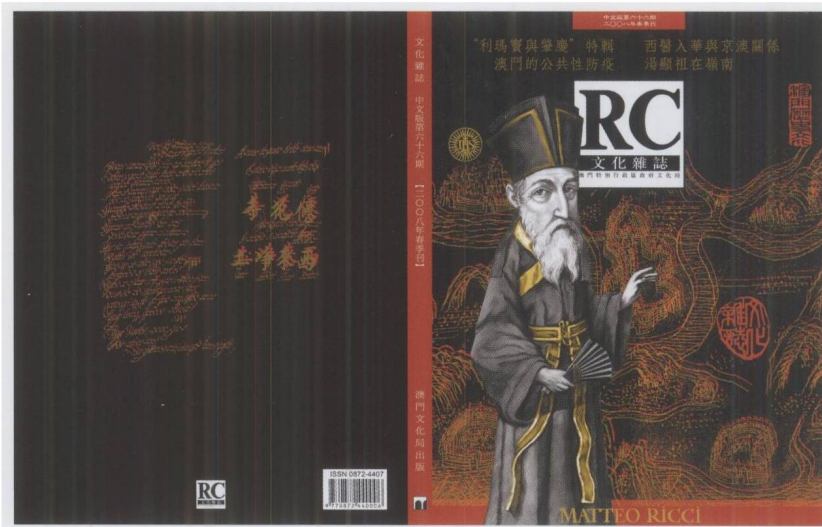
龔重謨 范舟遊

肇慶學院

肇慶市博物館

澳門何東圖書館

澳門文化研究會暨畫家趙紹之



本期封面由馬偉達 (Victor Marreiros) 設計



是一份研究歷史文化的雜誌，亦為切磋學問的自由論壇。其宗旨是推動東西方文化交往，探討澳門獨特的個性及中外文化互補的歷史，藉以促進澳門與海內外的學術交流。

為此，本雜誌刊登任何有關上述主題的文章，祇求學術價值，不拘思想見解；作者文責自負，其理論和觀點並不代表本刊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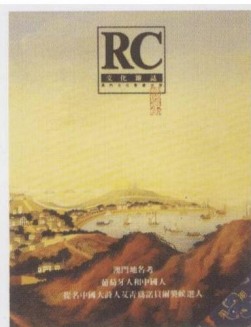
本雜誌編委會有權不發表與不退回無約投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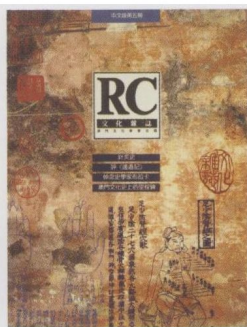
是一份季刊，用中文和外文兩種文本出版，根據不同語言讀者的實際情況，在內容上各有所側重。有心的讀者將會注意到這種差別，並領會我們的意圖。謹此，我們向各位讀者、學者和收藏家們推薦，訂閱全套（兩種文本）的《文化雜誌》會有更大的參攷與收藏價值。

觀 迎 訂 閱 文 化 雜 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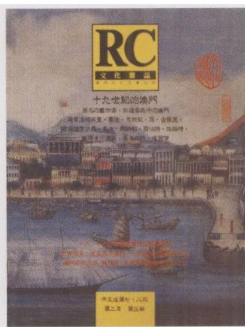
預訂或補購四冊以上即獲五折優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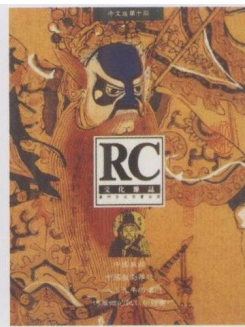
中文版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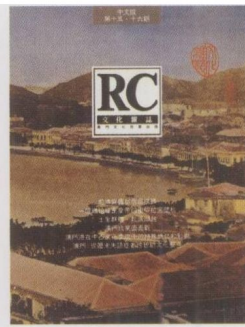
中文版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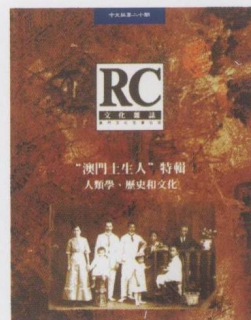
中文版第7-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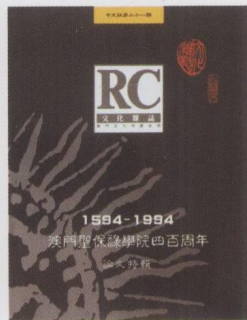
中文版第10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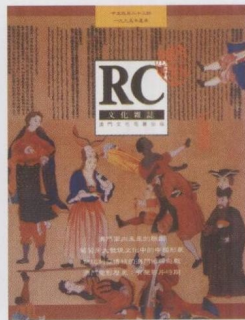
中文版第15-1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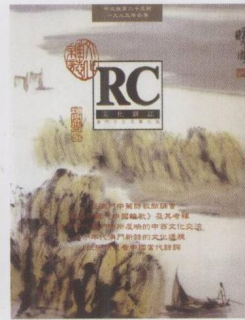
中文版第20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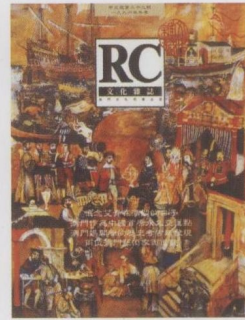
中文版第2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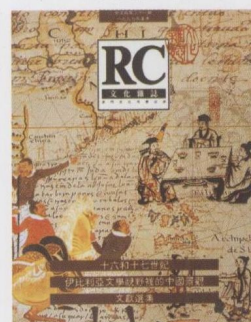
中文版第2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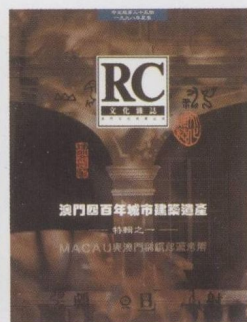
中文版第2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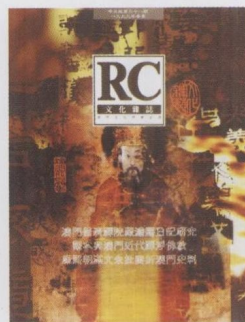
中文版第29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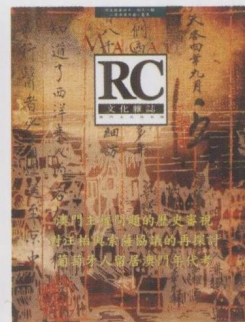
中文版第3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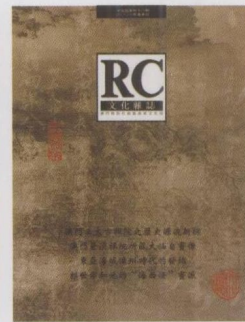
中文版第3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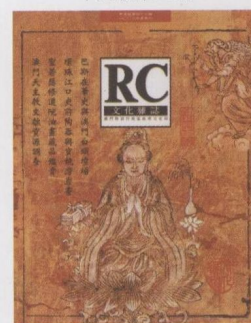
中文版第3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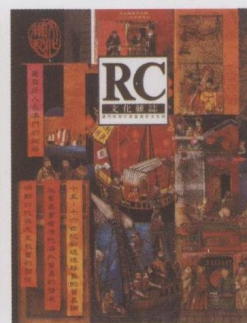
中文版第40-41期



中文版第4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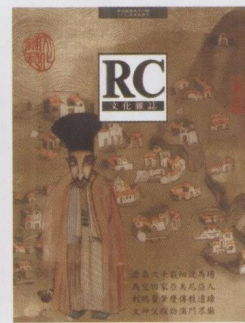
中文版第4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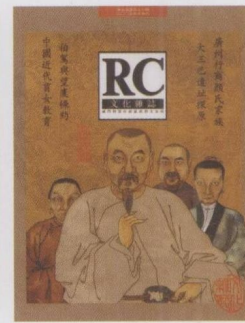
中文版第50期



中文版第51期



中文版第56期



中文版第57期

《文化雜誌》第一期至最新一期仍可補購

零售價格（不包郵費）—澳門：澳門幣80元；澳門以外：10美元

優惠價格（不包郵費）—訂閱全年四期或一次購買四冊可獲五折優惠

郵寄費用—中國及亞洲（每本）空郵：13美元；平郵：4美元

世界其它地方—（每本）空郵：19美元；平郵：6美元

可使用《文化雜誌》隨刊訂購附頁郵寄訂購或前往澳門中央圖書館、

歷史檔案館、觀音蓮花苑以及澳門各大書店購買



目錄



• 特輯：利瑪竇與肇慶 •

重建僊花寺紀念利瑪竇

弘揚中西文化交流的優良傳統

雷 強 1

利瑪竇在肇慶、韶州和南雄

黃啟臣 6

肇慶是中國近代地理學發祥地

司徒尚紀 許桂靈 15

利瑪竇視野中的中國科技

彭少輝 黃世瑞 19

利瑪竇行略及其身後的漢學研究

王超傑 27

論利瑪竇的中國音樂觀

范曉君 31

利瑪竇肇慶傳教的文化透析與反思

邱瑞祥 37

利瑪竇“送禮”初探

謝貴安 44

一位最早在肇慶傳播西方文化的人

蕭健玲 65

利瑪竇及其相關歷史事件年表

劉偉鏗 107

馬格里奧庫勒先生肇慶赴會始末

何凱文 129

(附) 馬格里奧庫勒〈利瑪竇與中國情懷〉譯文

• 歷 史 •

從澳門到北京宮廷

——清前期西醫入華與京澳關係

董少新 135

1895年鼠疫：澳門的公共性防疫

——以《鏡海叢報》為主要分析樣本

郭衛東 146

明清時期天主教著作插圖版畫與傳教

葉 農 于麗萍 159

葡萄牙人居留澳門考略

黃鴻釗 171

1513-1522年中葡關係進程的逆轉及其原因

張廷茂 181

• 文 化 •

湯顯祖在嶺南

葉重謨 范舟遊 186

重建僊花寺紀念利瑪竇 弘揚中西文化交流的優良傳統

雷 強*

在廣東肇慶建一座紀念館，紀念利瑪竇在歷史上開拓中西文化交流的偉大貢獻，已經在多個歷史、文化研討會上提出過，已不是甚麼新鮮事兒。但因為別的甚麼原因，社會上一直未見有實質性的回應。我認為在當前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人民生活穩步上升、綜合國力顯著上揚、我國社會政通人和百業俱興的大好局面下，排除一些障礙在肇慶建館紀念利瑪竇，弘揚中西文化交流精神，應該是時候了。

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

意大利人耶穌會士利瑪竇神父受該會派遣於1583年從澳門來肇慶傳教。在肇慶六年，他以為我國人民崇尚佛教，自己削髮剃鬚披袈沙，自稱“西僧”，以便接近群眾，易於傳教。他利用從西方帶來的各種器物如自鳴鐘、地球儀、世界地圖、三稜鏡、望遠鏡、日晷和各種精裝西文圖書等於臨時住處展示，並且向群眾講解，宣揚西方近代科學知識。他着重依靠對他有好感的各級地方官員的保護和支持，得以在肇慶居下來。他主持建造了中國第一所教堂——僊花寺。在肇慶，他得到知府王泮的幫助，覓地建教堂兼居所，還給教堂題名為“僊花寺”。王泮還送來親手書寫打造的匾牌掛在教堂門上，並喻知居民不得干擾。在肇慶以及後在韶州、南昌、南京以至北京，利瑪竇著書立說，介紹及應用西方一系列科學技術知識，撰寫教理。利瑪竇以科學傳教打開中國人的視野、增進新的知識技術，造福中國社會，也使他聲名昭著，有助於他的傳教活動，進而得到朝野贊譽及皇帝的重用。

在利瑪竇從西方帶來的各種器物中，雖都不是當時西方最新、最尖端的科技成就，但對於當時的人

們來說，都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奇效實用之物，確實使大眾開了眼界，並且對多個科學技術領域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有的還是奠定了基礎的作用。

世界地圖開拓了人們的眼界。利瑪竇在教堂中懸掛他帶來的〈萬國輿圖〉（西文世界地圖），是最早傳入我國的世界地圖。它引起了人們特別是士大夫們的極大興趣。它與當時中國的世界地圖《天下總圖》（當時的“廣輿圖”、“輿圖志”統稱為“天下總圖”）大不相同。中國過去因為地大，自稱“中央之國”，把中國畫在地圖的中央，周圍畫一些已知小國和一些海島，加起來都不及中國一個省大。所謂的“世界”僅限於中國的十五個省，既沒有經緯線，也沒有地帶劃分。國人對比西文地圖，聽了利氏對西圖的介紹分析，才知道世界之大，國家之多，中國祇佔世界東方部分的一個小角，使人們第一次看到整個地球的面貌，知道地球表面有五大洲、子午線、經緯度和五大地帶的劃分。中國人在這個時候才開始睜開眼睛看地球。王泮十分贊賞這張西文世界地圖，要求利瑪竇將該圖譯製，將中國放在圖的中央，並加上中文說明。利氏高興地照辦了。他作了一些技術處理：“抹去了福島的第一條子午線，在地圖的兩邊各留下一道邊，使中國正好

*雷強，廣州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

出現在中央。”⁽¹⁾該圖於1584年10月完成，名叫“山海輿地全圖”。王洋叫人刻印，作為禮品分送其省內外的要人和朋友。利瑪竇後來於1595年修改之，在蘇州、南京、北京等地多次重版，祇在南京便翻刻印製了十二次之多，廣為流傳。⁽²⁾利氏入北京後為配合神宗心意，測量了南京、杭州、北京、西安等地的經緯度，特別繪製了〈坤輿萬國全圖〉，將中國畫在中央，並按地球經緯度製作，將世界五大洲和五帶的地理科學知識詳加介紹給中國，此即為中國近代世界地圖之始。⁽³⁾

1602年耶穌會士湯若望繼利氏帶來的望遠鏡和自鳴鐘之後，又帶來新式望遠鏡，並於1626年用中文著《遠鏡說》一書，詳細介紹望遠鏡的原理、性能和製作工藝，此為近代光學傳入中國之始。自鳴鐘自肇慶傳入中國之後，近代機械技術傳入廣州，廣州工匠即按利氏原理仿造自鳴鐘。1627年由耶穌會士鄧玉函口授，王徵筆錄著《遠西奇器圖說錄》，在北京出版發行。此為我國介紹近代物理學知識的第一本著作。⁽⁴⁾

利氏運用上述帶來的世界地圖、望遠鏡、三稜鏡、日晷等器物的使用，向人們介紹了天文科學知識，是西方天文學傳入中國之始。後又於1605年翻譯出版了天文學專著《乾坤體義》。此書上卷、中卷談及日月地三者關係及“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為一球”，以及“日球大於地球，地球大於月球”之科學知識。利氏還著《經天略》一書，將西方已測定的諸恆星編成歌曲，便於中國民眾背誦掌握。繼利氏之後，李之藻著《渾蓋通憲圖說》一書，具體介紹了“地圓”、“地動”理論，使中國首次衝破傳統的“天圓地方說”。⁽⁵⁾

《乾坤體義》下卷皆言算術，是西方近代數學傳入中國之始。1607年，由利氏口授，徐光啟筆譯歐幾里得著的《幾何原理》一書（凡六卷），向中國介紹了西方近代數學的最基本內容知識。⁽⁶⁾1607年利氏和徐光啟合譯《測量法義》一書，介紹了勾股、測量知識。1608年，又由利氏口授，李之藻筆錄《同文算指》一書，闡述比例、級數、開方等知識。其後利氏和徐光啟合著《測量異同》、《勾股義》兩書，詳釋三角學的知識。⁽⁷⁾

羅明堅與利瑪竇兩神父在肇慶期間，為了攻下漢語難關，他們重金請來福建秀才當老師。利有學習外語的天份，記憶力很強，多年刻苦學習，已精通中國語言文字。他是西方第一個精通漢語的傳教士，不但能操流利的中國語，還能用漢文譯著。他在華二十七年中，漢文著譯共有十九種。利氏在攻讀漢語過程中，與羅明堅合編一本《葡華字典》，名叫《平常問答詞義》，它是我國第一部中西文字典，首創用拉丁字母注漢字語音，為中文拼音開闢一條新途徑。在肇慶，利氏編纂第一部中文天主教教義著作《天主實錄》，對當時傳教起了很大作用。⁽⁸⁾

明代中葉開始的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大規模傳入，主要是由入華耶穌會士在傳教之時同時帶來的。它是一種主觀上傳教而客觀上傳播西方科學技術文化的過程。這就是通過耶穌會士為媒介的歷史上稱為“西學東漸”的過程。而其中最顯著的代表莫若利氏。

不僅如此，利氏在傳教中刻苦鑽研中國典籍。他在韶州受其學生瞿太素啟發影響，感覺到在華傳教首先要得士大夫認同，於是破佛揚儒，脫卻僧裝，留髮束髮，改穿儒服，緩談“歸化”（基督），多講實學。這是利氏在華活動的一次重大策略轉變。

其實利氏確是悉心鑽研儒家學說。祇要看他用外文著釋儒家學說即可見一斑。1593年，利氏在韶州把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譯為拉丁文並“加寫短短的註釋，以便所言更加清楚”，寄回意大利出版。這是四書第一次全部譯為外文之始。1620年比利時耶穌會士金尼閣把《詩》、《書》、《易》、《禮記》、《春秋》五經譯為拉丁文，在杭州刊行。

利瑪竇對孔子的學說有深刻的理解。對於中國人的禮貌孝道，他作了概括和形象的描述：“對於他們來說，辦事要體諒、尊重和恭敬別人，這構成溫文有禮的基礎。”“如果要看一看孝道的表現，那麼下述的情況一定可以見證世界上沒有別的民族可以和中國人相比。孩子們在長輩面前必須側坐，椅子要靠後；學生在老師面前也如此。孩子們總是被教導說話要恭敬。即使非常窮的人也要努力工作來供養父母直到送終。”“中國人比我們更尊敬老師，一個人受教，那怕祇有一天，他也會終生都稱老師的。”⁽⁹⁾如

果不是結合在中國社會長期生活的實際，一個外國人對孔子之道有如此深刻的體會是不可能的。利氏在晚年用意大利文撰寫的《天主教傳入中國史》（又稱《中國割記》），與之合撰者之一同會比利時人尼古拉·金尼閣，將之從意大利文譯為拉丁文版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之後，各種譯本紛紛出現，計有拉丁文本、法文本、德文本、西班牙文本、意大利文本。原書的英文本於1942年出版，書名為“十六世紀的中國——利瑪竇割記，1583-1610”，中譯本在近年面世，書名為“利瑪竇中國割記”，即現在發行的1983年版本。該書全面忠實地概述了中國古代的政治政制、經濟、思想、地理、歷史、文化等方面的情況及其本人的傳教活動，是一個親身經歷的真實記錄，與那些道聽途說或是從書本上得到的一些資料和知識實不可同日而語，而據此研究得出的結論當然也與之迥異。明中葉隨着大批傳教士入華傳教，耶穌會士陸續來華開展教務，西方探究中國各個方面特別是儒家學說的研究日益增多，形成“中學西傳”的過程，“漢學”從此興起。利瑪竇所研究的中國是真實的中國、活生生的中國，可以說是高品質、高水準的漢學之始，所以有人稱“利瑪竇是漢學的開山鼻祖”。⁽¹⁰⁾

中西文化交流是雙向的，既有“西學東漸”，也有中學西傳的過程，這兩者突出地結合在利瑪竇身上。在歷史上，利瑪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臺灣的方豪神父高度評價利瑪竇對於中西文化交流所建立的功績：“利瑪竇為明季溝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華，迄於乾嘉厲行禁教之時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為巨觀，西洋近代文學、曆學、數學、物理、醫學、哲學、地理、水利諸學，建築、音樂、繪畫等藝術，無不在此時傳入。”⁽¹¹⁾

據史籍記載，基督教傳入中國，在明末清初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們入華之前有過兩次。第一次是唐代基督教聶思脫里派的傳入，被稱為景派。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就曾被明清之際的耶穌會士考訂過，但沒有留下多少痕跡。第二次是元朝，其統治橫跨歐亞，基督教再度傳入。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就提到中國有基督教堂。利瑪竇也有記載說

中國在五百年之間一直有基督教的信徒⁽¹²⁾，但沒有甚麼突出的表現。現在所講的基督教傳入，是指明清之際以耶穌會士為代表的第三次傳入的基督教。如方豪先生所言“中西文化之交流蔚為巨觀”，利瑪竇神父是這個時期的傑出代表。所以從中西文化交流角度看，利瑪竇在歷史上是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實不為過。

重建僂花寺 弘揚中西文化交流精神

建館紀念利瑪竇，弘揚中西文化交流的優良傳統，在肇慶還有意義而又較現實的一個方案是恢復僂花寺“原貌”。這樣會令人想起利瑪竇在肇慶開始他的中西文化交流事業，儘管他主觀上是為了傳教而來的，客觀上卻是開啟了嶄新的中西文化交流大業。這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在利瑪竇之後，中西文化交流已成為不息的洪流，利瑪竇開啟的事業是偉大的。

但在具體重建僂花寺時會碰到一些技術問題。關於僂花寺形狀及其規模，利氏在《割記》第四、五章中祇講了一點，不詳細不具體，希望今後在其它資料上去發掘。關於利氏的資料搜集及研究，廣東的學者一直在努力進行。前幾年有羅方光在《肇慶文史》第二輯上（1985年10月）發表的〈利瑪竇在肇慶〉一文，今年（2003）有司徒尚紀的《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一書（中國評論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5月），黃啟臣主編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廣東經濟出版社2003年5月），劉偉鏗的〈內陸海洋兩大文明的演進與嶺南漢族三民系形成的歷史探源〉一文，陳實〈明清時期基督教文化傳播的先驅——王泮〉（《江西社會科學》2002年5月）一文，都在探索利瑪竇及其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在這裡不得不談到被利氏譽為他的保護神和依賴人的肇慶知府王泮。在肇慶的日子裡，如果沒有官府的支持，利瑪竇就無法立足，更不用說傳教了。甚至可以說，當年如果沒有王泮很可能就沒有利瑪竇。現在要備齊王泮這個為官清廉有德政的地方官員的資料是不容易的。然而要建館，肇慶市歷史名城研究會的同仁完全可以擔當起這個重任。不少海內外和境內外的

朋友多次表示可以從圖書資料、經費上給以協助和支持。1998年利氏的故鄉意大利安柯那省的馬塞拉塔市給肇慶市寄來一尊利氏銅像，卻被置於海關倉庫裡，好幾個月都沒去領；後來由天主堂的李神父將銅像領回，供在教堂側面的大廳供人瞻仰。神父雖然沒有發出甚麼通知，但仍不時有些外國朋友前來教堂參觀瞻仰。北京市為迎接新世紀的到來而建造“中華世紀壇”，其中心世紀廳以環形浮雕群像來展示中華文明幾千年發展史，浮雕中姓名可考的人物不過六七十個，其中就有兩個外國人，而且都是意大利人——一個是馬可波羅，另一個就是利瑪竇。⁽¹³⁾在我們看來，利瑪竇開啟的事業首先不是傳教而是擔當文化大使，利瑪竇是世界文化名人。肇慶市政協副主席劉偉鏗先生說得好：“利瑪竇是一個世界品牌！”我認為利氏首先是一個文化品牌，然後才是一個旅遊品牌。對於肇慶來說，說得上旅遊的世界品牌就不多，我們無理由將之長期擱置起來。如果紀念館一時未及興建，我們建議可以在現在的肇慶博物館內設一個室來作紀念，亦可當作建館的準備。

今天我們紀念利瑪竇是為了表明我們中國人民學習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先進科學的部分，是我們民族振興的必由之路，從而增強實行對外開放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表明中國政府和人民對友好相處、平等交往的各國文化使者的肯定與友情，也顯示了中國政府實行尊重歷史、尊重科學、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各項開明政策。⁽¹⁴⁾

歷史在前進 認識在提高

這次研討會，我之所以將一篇2003年寫就而未能以原題公開發表的文章提到大會上交流是有原因的。2003年在澳門召開了一個珠江流域西部與澳門旅遊資源開發問題的研討會。許多澳門、外國尤其是葡國和意大利的朋友到肇慶旅遊，都帶着懷念之情想去看看利瑪竇生活和工作過的地方。他們找了很久，結果祇看到一小段陳舊的斷牆裂壁，多少有點失望。在他們心中利瑪竇是個偉人，是他們的驕傲。這使我萌發一種想法：肇慶得趕緊造一些像樣

的東西來紀念這位偉人，才對得起我們的國際友人，應該感謝利瑪竇對開拓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我於是便寫了這樣一篇短文；但遺憾的是，會上沒有對此作任何反應，祇好作罷。其時亦有人勸我說，國際政治鬥爭很複雜，利氏之名字很敏感，不能隨便出現，勸我不要再搞了。我甚不以為然，認為這種牽強附會的說法不是歷史觀點，不是實事求是的觀點。我當時還未知道2001年10月在北京已召開過一次“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在2003年將提交大會的三十六篇論文和發言選出二十六篇出文集中文版（另有英文版），文集的名稱為“相遇與對話”，內容議題相當廣泛，圍繞明末清初中西文化歷史交流的有關問題，包括歷史、文學、語言、藝術、科學、宗教、神學、外交關係、經濟交往、古籍版本比較等方面；但細看之下，發現在文章標題上沒有一篇提到利瑪竇，對比於利氏在這段期間的貢獻，就有欠公平了。會議討論形成一種富有哲理性的認識，值得我們很好地體會和思考一下吧——

實際上中西文化的相遇與對話，正是其文化主體人的相遇與對話。（……）我們在中西文化的溝通和對話上，不僅要尋找其同一性和互補性，也必須清楚認識其個殊性和差異性，既應有求同存異的努力，亦需要和而不同的冷靜。我們應以歷史學家的執着和姿態，在歷史資料的發掘和梳理中，獲得解決歷史疑難的思路和睿智，從而使我們的歷史學有新的收穫，並可能促進我們的歷史有新的突破。（卓新平：《相遇與未語》前言）。

這次在廣東肇慶舉辦的“第一屆利瑪竇與中西文化交流學術研討會”（2006年12月9-10日），也是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相遇與對話”。來自北京、廣州、山東、湖北、海南、澳門等地以及意大利的專家學者連同肇慶本地的專家學者五十多人參加了這個研討會。他們以“肇慶在利瑪竇文化傳播中的歷史地位和影響”為主題，展開了為期兩天的熱烈討論，還就肇慶如何挖掘中西文化交流歷史文化的積澱提出一些具體建議。會議收到四十多篇論文，有

趣的是這些論文絕大多數的標題都寫上利瑪竇的名字了。就連這次研討會的名稱也耀眼地突出了利瑪竇的名字，這是實至名歸的。既然已有數以百計的論文都在論證而且還會繼續論證利瑪竇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的貢獻，為何要隱去他的大名呢？或許有人說，利瑪竇在華這段時間對整段明史或明末清初來說，祇是一小段時間，當時的社會主流文化也不是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們所從事的“東學西來”，何況傳教士來華的目的主要是傳教，要改變國人的信仰，而不是開拓中西文化交流活動等。這些“論點”，在余三樂提供給大會的書面文章〈利瑪竇對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貢獻及其歷史地位〉中已辯駁清楚了。司徒尚紀的〈利瑪竇對中國地理學劃時代貢獻〉、黃啟臣〈利瑪竇在肇慶、韶州和南雄〉、曾崢〈對“中國現代數學起源於肇慶”命題的若干思考〉、徐新〈利瑪竇和傳教士向中國傳播油畫〉、劉偉鏗〈利瑪竇及其相關歷史事件年表〉、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學法蘭西斯科·馬格里奧庫勒的〈利瑪竇和他的中國情懷〉、韋相伍〈肇慶——利瑪竇成名之地〉、陳增岳〈試論利瑪竇“耶儒會通”的傳教方略〉和其它未及全讀的論文等，已從各個方面頌揚利瑪竇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功績。對於有些商榷文章，如謝貴安〈利瑪竇“送禮”初探〉、龔重謨〈湯顯祖在肇慶遇見的傳教士不是利瑪竇——也談湯顯祖與利瑪竇〉和一些不同看法，也展開了認真和熱烈的討論。研討會自始至終在和諧、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祇可惜研討會會期太短，而活動項目多，用於研討的時間不足，有的同行我還來不及進一步認識便分手了。

對於我個人來說，深感有幾點認識上的提高：

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文化碰撞、“相遇與對話”）中評價歷史人物主要的是其人其事對我國傳統文化主流產生甚麼影響，祇要它的效果對傳統文化主流產生促進作用便應該肯定；而不是僅看或主要看其背景動機，那是次要問題。

二、這次以“利瑪竇在肇慶活動”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對挖掘、整理肇慶地方特色歷史文化資源、加強中西文化學術交流是成功的。肇慶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肇慶學院在相對短促的時間內，克

服了種種障礙和困難使會議得以如期順利舉行，其艱巨之處非籌備人員是無法感受到的。會上提供的論文有很大部分是肇慶學者所寫，特別是肇慶市的年輕學者所寫。青年人從事考古文獻工作及其感觸是獨特的也是不容易的，值得慶幸。這也旁證了我在〈重建僊花寺，紀念瑪利竇〉一文中所述及的靠肇慶的力量完全可以建設起“僊花寺”來的看法。參加會議的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學建築師法蘭西斯科·馬格里奧庫勒說，他設計了一個“僊花寺”藍圖，我們希望他能拿出來甚至做成模型供大家參考和進一步討論。這次研討會引起了意大利政府駐華機構和那不勒斯大學的關注，利瑪竇故鄉馬切拉塔市政府通過廣州領事館轉達了組團來肇慶訪問並與肇慶建立友好合作關係的願望。

三、會議還特別組織一個“溝通中西文化第一人利瑪竇”陳列（歷史文獻、圖片、繪畫以及場景等形式），收到不錯的效果，不妨添加一些實物，成立一個以利瑪竇在肇慶為主體的展覽館供遊人參觀。其中《利瑪竇在肇慶》可廣印成書，而“陳列簡介”右上方的利瑪竇圖像則可印成明信片發行。

四、建議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由肇慶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和肇慶學院為主要發起人，成立“利瑪竇與中西文化交流學術研究會”。現在是時候了，應着手進行。

【原文寫於2003年，因故未能按原題公開發表；今為參加肇慶第一屆利瑪竇學術研討會（2006年12月），按原題發表。】

【註】

- (1)(9) 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割記》，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中華書局1983年3月出版，頁179-180；頁11-12。
- (2) 羅方光：〈利瑪竇在肇慶〉，《肇慶文史》第二輯，頁20。
- (3)(4)(5)(6)(7) 黃啟臣主編：《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廣東經濟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頁467；464；462；461；463。
- (8) 羅方光：〈利瑪竇在肇慶〉，《肇慶文史》第二輯，頁13-16。
- (10) 羅方光：〈利瑪竇在肇慶〉，《肇慶文史》第二輯，頁15。
- (11) 方豪：《中國交通史》下卷，頁692，嶽麓書社1989年版
- (12) 汾屠立：《利瑪竇歷史著作集》卷一，頁344，352，469，參見《利瑪竇中國割記》中譯者序言頁24。
- (13)(14) 余三樂：〈利瑪竇墓地歷史變遷〉，《當代北京史研究》2003年3月，頁35。

利瑪竇在肇慶、韶州和南雄

黃啟臣*

天主教耶穌會意大利會士利瑪竇（1597年8月-1610年5月任中國傳教區會長）從澳門進入廣東肇慶、韶州（今韶關市）和南雄（今南雄市）傳教長達近十二年之久。有鑒於此，本文擬就利氏在這三個地區傳教和溝通中西文化的活動歷史軌迹作一闡述，以便從一個側面說明他確實是明季溝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功不可沒。

明清之際（16-18世紀中葉）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外歷史上最重要、最大規模的一次，其載體主要是天主教耶穌會士，而出生於意大利中部之東馬切拉塔（Macerata）一個藥劑商人家庭的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是溝通這次中西文化的第一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嚴格地說，此時期中西文化的實質性接觸和互動，是從利瑪竇正式開始的。利瑪竇自1583年（萬曆十一年）9月10日經澳門進入中國內地傳教和溝通中西文化第一站是廣東肇慶（1583年9月10日-1589年8月24日）；第二站是韶州和南雄（1589年8月25日-1595年4月18日）；第三站是南昌和南京（1595年5月31日-1600年5月18日）；第四站是北京（1601年1月24日-1610年5月11日）共二十七年八個月，最後在北京逝世。本文擬就利氏在肇慶、韶州和南雄的十二年期間的傳教和溝通中西文化的活動作一闡述，以求正於方家。

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進入和租居澳門初期，隨葡國商船而來澳門的天主教耶穌會士開始在澳門傳教，但由於當時採用要入教的中國人葡萄牙化的傳教方法，加上耶穌會士不懂中國語

言，所以未能進入內地傳教。有鑒於此，耶穌會決定派遣懂得中國語言的意大利會士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為遠東教務視察員，於1578年（萬曆六年）來澳門巡視，後寫信給耶穌會長說：“如要打開這一進路，唯一可能的辦法，必須改變目前在其它諸國所採用的傳教法。”最重要的條件是會讀、會寫和會說中國話，並盡量熟習中國的禮規和民情。他認為，要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不能寄希望於當時在澳門的耶穌會士，必須另派新的有理想有中文基礎的神父來中國傳教。⁽¹⁾他又寫信給駐果阿的耶穌省會長，積極推薦主張用中國語言文字對中國傳教的羅明堅（Michele Ruggiere）東來中國傳教。羅氏即於1579年（萬曆七年）7月22日抵澳門，請一個中國畫家教他攻讀中文，史稱：

羅明堅神父之第一授業師為中國畫師，利用毛筆教授中國文字之形義，迨彼自信所學已足之時，遂欲入中國內地（……）⁽²⁾

羅明堅經過二年又二個月的學習，已經掌握一萬兩千個中文單字和中國的主要禮節。於是，他於1580-1583年間（萬曆八年至十一年）隨葡萄牙商人四次到廣州參加定期市（交易會），從中實踐講中國話和接近廣東地方政府的官員。由於他彬彬有禮，

*黃啟臣，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澳門史專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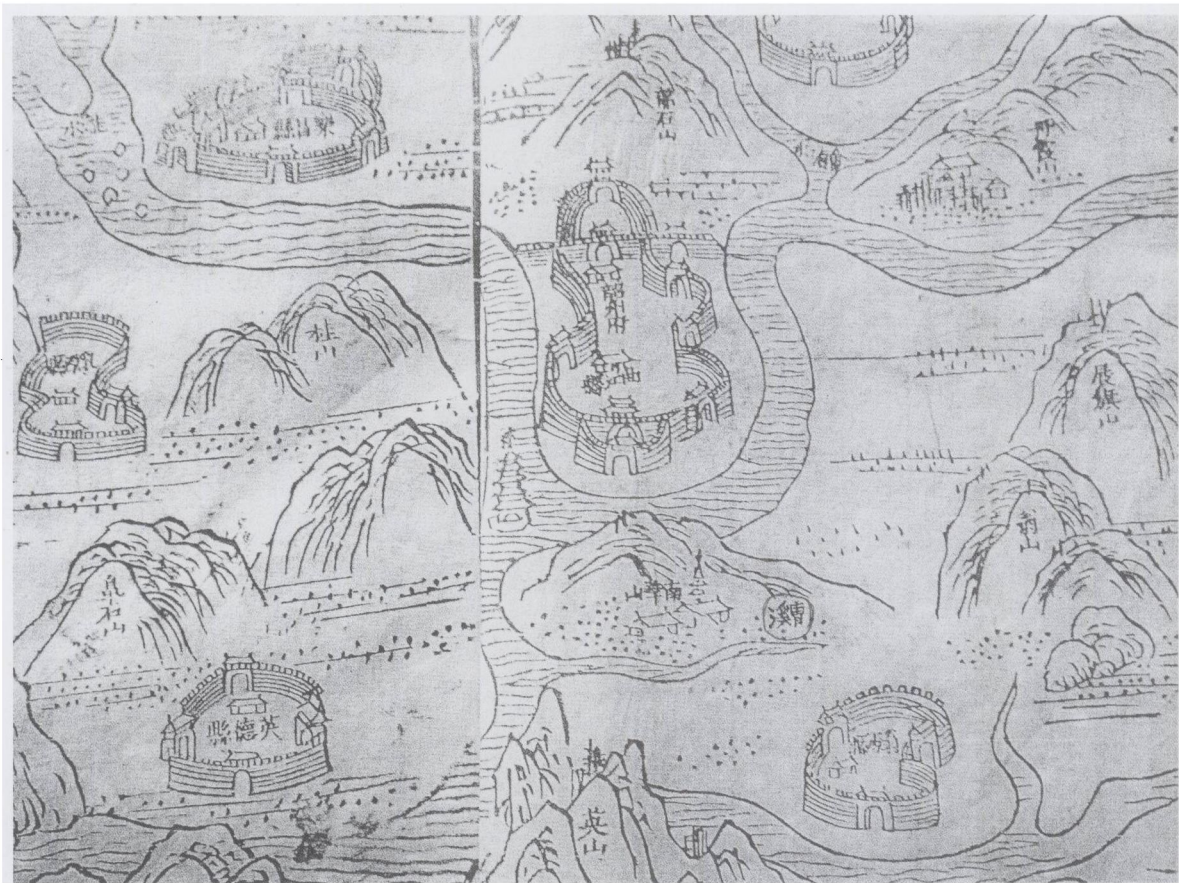
博得兩廣總督陳瑞好感。1582年（萬曆十年），承總督邀請到肇慶（總督駐地）去長住。范禮安派剛從印度來澳門的巴範濟（Francesco Pasio）陪羅氏於1583年（萬曆十一年）同往肇慶。總督迎為上賓，撥天寧寺給他們居住。但不久陳瑞因罪被革職，羅、巴兩氏祇好回澳門。後新任總督郭應聘和肇慶知府王洋却又派人去澳門請羅、巴再來肇慶。時巴氏已調往日本。1583年9月，耶穌會改派1582年8月7日抵達澳門的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陪羅明堅同赴肇慶，仍住天寧寺。於是，羅、利二人便在肇慶開始傳教活動。這是耶穌會士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之濫觴。

利瑪竇到澳門後，即在羅明堅建立的“聖馬爾定經院”一面讀習經理，一面“學華語、讀華書”⁽³⁾，很快就對中國話“已稍有成就”⁽⁴⁾。因此，他和羅明堅在肇慶都具有用中國話進行傳教的有利條件。他們定居後，在郭應聘、王洋的幫助下，於1584年

（萬曆十二年），在肇慶城東崇寧塔附近耗資二百五十兩銀建立一所教堂及寓所，作為傳教活動的場所。這是耶穌會在中國內地建立的第一座天主教歐式教堂。為吸引民眾的歡心和接近民眾，他們將自己帶來的西洋奇器如西洋鏡、日晷、自鳴鐘、三稜鏡、油畫聖母像等，在教堂內陳列公開展覽，讓民眾參觀。頓時，不少達官貴人和民眾出於好奇心，都紛紛前來參觀，熱鬧非常。特別是利瑪竇繪製的《山海輿地全圖》，更吸引不少觀眾，一致以為古今奇觀。最後，他索性把這些西洋奇器統統送給肇慶官員，從而得到官紳的支持和尊重。他們還聽從瞿太素（江蘇常熟人，禮部尚書瞿景淳之子，住南雄）的勸說，放棄袈裟，改穿儒服，以便傳教活動。史料記載利瑪竇在肇慶傳教時說：

瑪竇初至廣，下船髡首袒肩，人以為西僧，引至傳寺，搖手不肯拜，譯言我儒也。遂就館





採自《康熙韶州府志》卷一

延師，讀儒書，未一二年，四書五經皆通大義。⁽⁵⁾

羅、利兩人在肇慶花了很大氣力傳教，取得旗開得勝的效果。據統計，“在1584年中，天主教信友，祇有三個。1585年，有十九或是二十個；1586年，有四十個；1589年有八十個”。⁽⁶⁾從而得到耶穌會東方傳教視察員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的贊揚，說肇慶“這些自動入教的教友，較別的國內的兩萬教友或日本的四萬教友，有同等的價值”。⁽⁷⁾利氏還以“與中國儒士交際當以學問為工具”⁽⁸⁾，向肇慶的文人官紳介紹天文、算學、理化等西方科學知識。同時，利氏努力學習中國文化，“苦心學習按圖畫人物，倩人指點，漸曉語言，旁通文字，至於六經子史等篇，無不盡暢其

意義，始策著書，發明聖教”。⁽⁹⁾利、羅還以高薪聘請一位有聲望的秀才為老師，經續研習中國的語言書法。為了幫助自己及來華的耶穌會士學習中國語言，他們兩人合作編寫一本最早的《葡華字典》，應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方法，注釋漢字讀音，全書共189頁。這對於西方人學習中國語言乃至漢語的拼音化，都具有重要的文化交流意義。與此同時，利氏在肇慶還結識了官紳學士如王泮、徐大任、滕伯輪、郭子音、蔣之秀、王應麟、鍾成錄等，大大方便他的傳教和溝通中西文化的活動。

然而好景不長，因為新任兩廣總督劉繼文從梧州來肇慶視察時，在文人譚君諭等挑唆下，看中了風景優美的偃花寺和教士寓所，決心將之購買改建成為自家歌功頌德的生祠。他遣下屬向利氏獻銀七百兩，作為購買偃花寺的價銀，但利氏不願受價，

說：“以敬天之地，不宜以買賣。”⁽¹⁰⁾ 劉繼文見利氏不領情，大怒，於1589年8月3日下令，限三日內，要利氏離開肇慶回澳門，並給六十兩銀子作路費。利氏祇好被迫離開肇慶，但也不願受六十兩路費。之後，劉繼文怕清朝官員非議他假公濟私，霸佔教士會所和教堂，故又令人追回已抵達廣州的利氏，並親自召見。這時，“素與利氏友善”的南雄知府王應麟便出面斡旋，對利氏說項：

總督不欲霸佔(會所)，故欲先生受價。利氏曰：若准我在南雄隨地擇購，可拱手讓也。⁽¹¹⁾

於是，劉繼文答應利氏要求。不過，劉建議利氏是否可先到韶州的佛教聖地南華寺去看一看，是否合適居住；如不合適，再去南雄府擇地，也不為遲。並當場把來肇慶公幹的韶州通判呂良佐介紹給利氏，要呂在路上保護利氏平安前往韶州。

二

1589年8月15日，利瑪竇偕麥安東(António d'Almeida)離開住滿六年的肇慶，經三水，逆北江而上，經過八天行駛，於8月24日到達南華寺。韶州通判呂良佐派人迎利氏到寺裡，找地方給他們安放行李。

南華寺原名寶林寺，是佛教六祖慧能的禪壇，坐落在韶州城南六十里的曲江曹溪(見曹溪門圖)。於南朝天監元年(502)為印度和尚智藥三藏所建，原稱寶林寺，唐龍朔元年(661)改名為中興寺；三年(663)改稱法泉寺；宋開寶元年(968)才改稱南華禪寺(見南華寺圖)。



〔上〕南華寺 〔下〕曹溪門

慧能在寺內說法三十六年之久，發展禪宗南派，影響深遠。利氏抵南華寺時，方丈出迎，引入客房，預備齋飯。方丈極贊利氏為西僧大德，承總督遣來，願以全寺相獻。利氏亦謙讓不已，答曰身為遠

客，暫借住寺房。見面相談之後，方丈聽利氏自稱僅來寺作客暫住，心中安然。之後引利氏參觀寺院，見利氏每過佛堂並不頂禮膜拜，心以為異。利氏看到天主教與佛教信仰迥然不同的情況，所以在南華寺住了一個晚上，翌日即由方丈隨同乘馬入韶州城，向兵備道表明不欲住南華寺，請求去南雄擇地建堂的要求，但兵備道卻安排他們先住韶州城外的光孝寺。光孝寺位於武水之西，建於唐代開元二年（714），名曰開元寺，後更名大梵寺，宋崇寧三年（1104）改稱法泉寺，致和中稱天寧寺，紹興三年（1133）改稱報恩光孝寺。寺前有曠地數頃，兵備道示意利氏可請准在曠地建立教堂及住所。於是，利氏向兩廣總督提出購地建堂所的要求，經總督批准，用八十多金幣購買了光孝寺前曠地，修建一座中國式樣的住所和教堂。史稱：

為避免敵意的指責，也為了防止官員們在室內舉行宴會，猶如他們在寺院裡所做的那樣，所以這所房屋是按中國式樣設計和建造的，祇有一層樓。房屋完工後，下一步是在附近蓋一座宏大精美的教堂，因為他們期待着在不久的將來有大量的新信徒。（12）

1590年秋天，光孝寺前的住所落成，利氏、麥安東和范禮安從澳門派來韶州協助利氏開展傳教的新會籍和澳門籍耶穌會輔理修士鍾鳴仁（Sebastião Fernandes）、黃明沙（Francisco Martins）四人遂僑遷新居，開展傳教活動。

三

利瑪竇在韶州站穩腳跟之後，積極開展傳播天主教的活動。

首先，利氏於1590年1月1日，將在澳門受過天主教教育和培養的鍾鳴仁和黃明沙兩青年洗禮加入耶穌會，以便在他們的幫助下進一步擴展傳教事業。史稱：

這兩個人抵達後不久，就加入了耶穌會，在韶州度他們的望道期。他們是第一批被接受入會的中國人，正如本書所將談到的，他們將證明對於神父們是一大幫助，在他們可貴的協助之下神父們克服了很多困難和障礙。（13）

利瑪竇為發展兩名會員感到非常高興，他慶幸天主教將在中國內地不斷傳播開來。

為了能在韶州更好地傳播天主教，他主張入鄉隨俗的適應性策略，自己蓄髮留鬚，不穿袈裟穿網袍，從而使中國人易於接受他，以取得成效。

因此利瑪竇神父對視察員神父說，他認為如果他們留鬚子並蓄長髮，那是會對基督教有好處的，那樣他們就不會被誤認作偶像崇拜者，或者更糟的是，被誤認為是向偶像奉獻祭品的和尚。他解釋說，那些人按規定要剃得光光的，頭髮要剪乾淨。他還說，經驗告訴他，神父們應該像高度有教養的中國人那樣裝束打扮，他們都應該有一件在拜訪官員時穿的網袍，在中國人看來，沒有它，一個人就不配和官員、甚至和一個有教養的階層的人平起平坐。（14）

與此同時，利瑪竇又“以傳播科學知識為佈道手段”（15），“顯示給中國人他是精於數學，精於製造鐘錶，及日晷，精於物理學，繪畫學，精於雕刻術及繪製地圖術，但是他絕隱蔽他的信德及司鐸的品格。他單是用博學者的活動，為開啟純正宗教的接近工作。”（16）他這種用博學者的才智為傳播天主教創造有利條件的科學文化活動，在韶州和南雄的六年多期間，最顯著的表現是在向瞿太素講學上。

瞿太素，名汝夔，江蘇常熟人，生於嘉靖二十八年（1549），幼年已博覽群書，聰明睿智，但不求仕進，恃其父景淳為官戶部尚書，而熱衷於周遊各省名川大山，追求煉丹之術。他遊至廣西，往訪兩廣總督劉繼文和嶺西道尹黃曾雨，得知利瑪竇的西學知識博大精深，無比欣羨，特地往肇慶謁見利



利瑪竇離開韶州經梅關古道北上南昌圖

氏。後至利氏定居韶州光孝寺時，瞿適寓居南雄，便又趕赴韶州，在光孝寺租得一室居住，拜利氏為師，要求學習西方科學知識。利氏於是先教他學習《同文算指》，後學《渾蓋通憲圖說》和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瞿太素從利氏學習，十分努力，日以繼夜，聽課時，勤力筆記，回到寓所，再整理筆記，重抄一遍，一年後，已翻譯了《幾何原本》第一冊：

然後他學習繪製各種日晷的圖案，準確地表示時辰，並用幾何法則測量物體的高度。（……）他運用所學到的知識寫出一系列精細的註釋。當他把這些註釋呈獻給他的有學識的官員朋友們時，他和他所歸功的老師贏得普遍的、令人豔羨的聲譽。（……）他日以繼夜地從事工作，（……）還為自己製作科學儀器，諸如天球儀、星盤、象限儀、羅盤、日晷及其它這類器械，製作精巧，裝飾美觀。（……）經驗證明，

神父們在這個人身上沒有白費時間。（……）在韶州和他浪跡的任何地方，他無休無止地贊揚和評論歐洲的事物。（17）

瞿太素還進一步向利氏學習天主教義，一連數天，聽之入神，反復詰問，心悅誠服，請求利氏為他洗禮入教；後來於1605年由王豐素神父（Alfonso Vagnoni）批准領受洗禮，正式入教，成為一名天主教徒，成為利氏的一個“忠實的朋友和真誠的崇拜者”（18）。利氏也通過這位忠實的朋友結識兵備道鄧美政、韶州知府謝臺卿、曲江知縣劉文芳、南雄知府黃門等地方官員，並結成好友，為他進一步開展傳教創造良好條件。

為了傳教，利瑪竇還在瞿太素的陪同下，應英德縣令蘇大用的邀請到英德，“去開導他的七十二歲的父親”，“老人很高興地聽到關於基督教教義和神蹟的解說，他願意當時當地就領洗”（19），祇可惜他八十歲時就在南京逝世了，未能如願以償。利氏